

中国主体、世界问题

——评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

张 锦

乐黛云先生所著的《跨文化方法论初探》一书，2016年9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先生在2015年由北京师范大学承办的“跨文化方法论研究首期讲座”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全书以《前言》和七个章节论述了乐先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跨文化方法论以及相关问题的新思考，尤为重要，此方法论问题直接面对的是当下世界的冲突和危机现状，回应的是“查理事件”等最新的世界紧迫问题。该著因而在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多维层面回应了金丝燕和董晓萍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丛书的策划目的——希望它们能为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建设提供砖瓦。阅读此书，不仅能再次与乐先生的思考照面，更能与已经86岁却依然勇于思索最前沿问题的乐先生的身影照面，这个身影将带领我们继续前行在充满责任意识文化之途上。纵观全书，正如第四节的标题《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重构》所示，乐先生以中国传统资源如何能应对当前紧迫的世界危机为论述主体和思虑中心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提炼与总结的跨文化方法论，这对广大读者启发甚大。

一、世界问题

对乐先生而言，现实问题一直是其思考的出发点，她的理论总是面向实践的理论，她对方法论和理论问题的关注也总是联系着文化与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实践的关系。所以跨文化对话并不是一个学院

的理论设想，乐先生分别从互联网、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记忆、文化冲突的危机、哲学的转向等方面详述了展开跨文化对话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它既关系到当下互联网新媒体所造就的地球村现实，关系到一系列世界各地恐怖袭击的冲突现实，也关系到影响现代世界格局甚深的历史现实，即两次世界大战，同时又关系到哲学层面的思维转向问题。乐先生全书是从“多元文化的发展及其当前遇到的问题”开始的，这个开始的背后是让我们震惊的《查理周刊》流血事件，所以“文化冲突的加剧与对多元文化发展的疑虑”^①是乐先生思考的基础，而其方法与理论探索的目的也正是要指向当下的文化与社会实践，即为努力“建构多元文化共存的命运共同体”^②贡献自己的力量。

西方问题的根源，正如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是“现代性的危机”。欧洲在从罗马帝国分裂、叙述和认同为不同的现代民族国家以后，一步一步由于现代性的信仰和追求，而以战争和殖民的方式将民族国家的概念撒播到全世界。这就导致了现在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僵化的内核，即自以为某部分人是高举优越文明之火炬的民族”^③，却歧视其他地区的人和民族，甚至到现在“欧洲人未能完成自身的去殖民化”^④；另一方面是“上世纪殖民体系瓦解后，一部分新独立国家的人们急于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⑤，而使差异的问题被不断凸显。加之后殖民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单一性和对多元价值的摧毁，有些欧洲国家的移民和新独立国家主张自我文化的绝对性，即文化孤立主义，以致以文化为名，其背后却是诸多的殖民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恶果的文化冲突不断发生。欧洲的历史与当下问题不断，而美国更是加剧了这些问题：“只要坚持个人利益最大

① 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② 同上书，第5页。

③ 同上书，第27页。

④ 同上书，第27页。

⑤ 同上书，第2页。

化原则，美国梦就不可能是个普遍有效的梦，因为不存在一个社会空间足以让每个人都获得成功”^①。“美国梦”继续了现代性和发展主义之梦，而美国梦的实现一定是以他者梦的牺牲为代价的。欧洲历史的债务重重，但现在还是有所反思的。乐先生反复引述了里夫金所谈的继美国梦后欧洲反思经济功利主义所提倡的精神家园问题，即“欧洲梦”问题。在乐先生看来，“欧洲梦”最终也是为了保护欧洲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乐先生希望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能够对解决世界问题产生意义，以中国文化为主体重构世界文化。

二、中国主体

乐先生一直与意大利阿尔曼多·尼兹（Armando Gnisci）教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这一方面是由于乐老师一向交友甚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有着相似的问题意识，乐先生多次提及尼兹的《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她总结尼兹的最重要的观点是：“尼兹又指出，很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但在精神上依然处在被殖民状态。也就是说，它们在精神上，或者无意识中会依赖过去的殖民文化价值观，而较少发掘自身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并在这个基础上与他种文化对话，使传统文化现代化，以致自身的文化仍然被他人所操纵。”^②所以作为制度现实的殖民体系结束并不代表殖民的真正结束，精神上或者无意识领域内话语的殖民即殖民的文化价值观的剔除在当前显得尤为紧迫。我们经常很容易识别殖民制度，但是我们自身内在的欧洲或者西方文化等级序列却很少被识别，以至于我们其实是用他者的眼光看待自我。最可怕的是我们对话的基础和前提经常是他人的殖民文化价值观。乐先生一直强调对话中的“话语”问题，如果没有一套摆脱了殖民和他者话语的自我话语参与对话，那么这个“对话”

^① 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第79页。

^② 同上书，第27页。

其实还是没有发生，所以乐先生强调要以自身传统文化为基础来与他者对话，同时使得传统文化现代化，否则我们的对话其实还是被他人操控的。这一点非常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去政治化”的语境中，我国很多学者以纯文学为口号而失去了对文学与文化主体身份的认同与关注，而乐先生一直非常看重文学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与新人文精神塑造的关系问题。乐先生与汤先生一直致力于通过传统的现代阐释来确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文学的主体身份和价值。

此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比乐先生年轻的学者都认为清末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文化患了“失语症”。而乐先生则坚持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在历史上从不接受殖民。百余年来，中国文化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归化他种文明而完全丢失自我。”^①因为乐先生发现：“从历史发展来看，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进行，也就是要通过自身文化屏幕的过滤，很少会全盘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②乐先生举了印度佛教在古代中国传播和马拉美在近代中国接受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乐先生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的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中国话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等；这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又成为中国宋明新儒学发展的重要契机。”^③另外，对于中国象征派诗人来说，法国那么多象征派诗人，我们独独对马拉美情有独钟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有那么强大的传统而且我们的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社会，并非完全被殖民。

在对话中，乐先生特别强调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来确立我们的对话主体位置和清醒意识，然后面向世界问题。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在网络化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问题一下子也就变成了我

① 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第42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③ 同上书，第8页。

们的问题，我们必须从传统资源出发，但我们要面对的却是当下的危机和问题，所以乐先生说：“从中国道家的宇宙观出发，最重要的就不是拘泥于人们以为是‘已定的’，其实仍在不断变化的‘确定性’，而是去研究当下的、即时的、能有效解决问题的从现实当中涌现出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中的可能性。”^①我们援引古今中外的资源都是为了面对现实中涌现出来的问题，而中国古代文化资源体现出我们在处理世界问题上的主体性贡献，即我们的问题意识和应对问题的策略始终应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重构”^②、“中国传统文化对化解文化冲突可能做出的贡献”^③。

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资源的问题，乐先生谈到了以下重要的观点。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意识，例如“以他平他”的含义是辨析他人并尊重他人，例如“和而不同”、“和能生物、同则不继”的“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④，还有“反者道之动”、“负”的思维方式、“执两用中、一分为三”、“五行相克相生”等文化资源对现代的参照意义。对于这些文化资源，乐先生认为最重的是要实现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乐先生对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有着自己的阐释：“文化自觉应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向，也就是说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这样的文化自己就不是回到过去，而必须面对现实，展望未来。”^⑤传统必须联系着过去与未来才能成为当下的和现在的有效资源。

非常有意思的是，乐先生还在这本小书中提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她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本就在一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的语境中，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始于推介外国文学，并力求在外国文学的多元语境下重新认识自己，以寻求发展新路，它的根基始终是

① 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59页。

③ 同上书，第67页。

④ 同上书，第91页。

⑤ 同上书，第66页。

中国社会和悠久的中国文学传统”^①。而这个发生是与用经典汉语对外国文学的翻译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些翻译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与表达方式。比如乐先生非常器重对“学衡派”有过影响的林纾的翻译，她说：“林纾翻译的速度很快……所以能做到这样，是与林纾本人极深厚的国学根基和他运用语言文字的卓越能力密切相关的。”^②乐先生一直以来都非常欣赏“学衡派”，这也与她对国学根基的重视有关。而且乐先生把林纾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林纾翻译这些小说并不完全是兴之所至……其次，他是把他的译述和更远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③，所以翻译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为它以卓越的汉语为基础。而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而言，乐先生多次引用杨周翰的话说：“而中国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④可见无论是现代文学还是比较文学都是国之命运的一部分，都是我们主体的选择。

三、跨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兼方法论的探索

乐先生在全书中提到了跨文化对话中几个重要的问题：1. 普遍与特殊的悖论。2. 保持纯粹与互相影响的悖论。3. 对话中的自我与他者矛盾。4. 差异与间距问题。5. 遥远的共鸣问题。

对于“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乐先生说：“必须承认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承认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对话才有根据。”^⑤“对话”的前提是同一个地球和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前提下，乐先生认为在“普遍与特殊”的问题上，“文化孤立主义与文化相对

① 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第99页。

② 同上书，第112页。

③ 同上书，第111页。

④ 转引自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第98页。

⑤ 同上书，第6页。

主义”都是不行的，因为“这就取消了对话的必要”^①。乐先生对“普遍性”有独特的理解：“追求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②即“普遍性”不是要求同质性，而是与时空结合的特殊性下的普遍性。其次，文化对话中总有保持独立和受到影响的问题，乐先生认为“从历史发展来看，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进行，也就是要通过自身文化屏幕的过滤，很少会全盘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所以独立地接受影响可能是常态。在对话中自我与他者的问题上乐先生强调要坚持“和能生物，同则不继”的原则。乐先生辨析了对话中差异与间距这两个范畴的不同指向：“差异建立在分辨（distinction）的基础上，它需要一个共同的前提。间距则来自距离（distance）。”^③而用“间距”的观点看跨文化对话问题则能有效地实现列维纳斯所说的面对面的思考：“因此，用间距的观念来研究中欧的跨文化对话，就必须一会顺着这一种思想而一会儿又顺着那一种思想，以便使它们面对面地互相反思。”^④莫兰的复杂性思维对跨文化对话的意义很大，在谈到莫兰时，乐老师指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即“遥远的共鸣”，并将之与中国的“秘响旁通”建立了联系，她说：“德国的莱布尼兹、法国的伏尔泰……等人都曾从中国文化获得启发和灵感，中国文化曾拨动他们心灵的琴弦，为他们的学术和创作开辟了新的视野……这种在文化接触中产生的神秘现象可能就是莫兰所说的‘共鸣’，可能也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秘响旁通’。”^⑤最后，乐先生总结了跨文化对话的总体原则：“只有空间方面与其他文化相接触，时间方面与过去的思想接触，才会促进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发

① 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第6页。

② 同上书，第57页。

③ 同上书，第10页。

④ 同上书，第12页。

⑤ 同上书，第40页。

展。”^①乐先生从时空两方面指出了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向度，而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也是跨文化方法论建设的基础。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① 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第31页。

商务印书馆